

打败你的不是同行,而是跨界。这是近来网络上流行的一句“哲理”,放在张经纬身上尤为贴切。

张经纬喜欢考古学,但所学专业是人类学,“阴差阳错”没有成为拦路虎,反倒成就了他用人类学知识去思考考古学问题,居然经常有些意外斩获,在考古学界曾引起不小的反响。本书是对张经纬近年来发表的文章的一次总结。全书分为考古中国、探索方法、中国进程、神话时代、趣史、诸野等六大板块。虽是合辑,前后文章之间缺乏统一架构下的严密逻辑关联,但从作者近年来主要关注方向来看,本书所辑文章总体上还是从多个维度较好地回答了书名所指的关键问题,即“中国从哪里来?”

人存于世,问题主要有三,即从哪里来,现在干什么,未来将向哪里去。考古学便是通过挖掘寻找器物证据的方式,努力探寻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前几年,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推出其畅销全球的历史著作《人类简史》,该书融历史学、人类学、生态学、基因学等多门学科,自始至终向读者说明这么一个得到诸多学科证实的历史事实,即人类最早起源于非洲,无论是后来繁衍了我们的智人,还是被智人消灭的尼安德特人等,无出其右。尤瓦尔还勾勒了人类在全球的迁徙路线图。从这一视角看,今天人类文明虽有诸多分野,最终起源指向仍旧九九归一。

张经纬始终在强调这样的观

点,即无论是人类学还是考古学,均应从世界的视角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的视角看世界,这样才可能对考古界孜孜以求的“发现‘最早中国’”理念有一些更全面也更科学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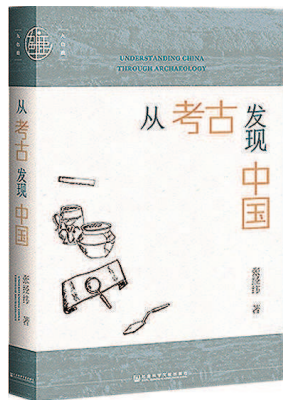
张经纬爬梳考古信息和诸多著作后指出:“周人和秦人并非一脉相承的整体,而是各有起源的不同文化”,“从中国文明史的开端以来,夏、商、周三代都是从东亚核心区的‘外围’一点点内迁的,并不是一开始就以所谓的‘中原’为根据地向外发展的。”就是说,“中国”概念的形成,本质上是迁徙到中原后的各路人群众海纳百川的结果。为构建抵御外部的合力,他们于是“建立了‘华夷之辨’的修辞方式,封自己为正统,还把周边的人群称作‘夷’”。或者说,最早的“中国”概念更大程度上彰显了政治和军事意图,由于其范围并不十分固定,地理内涵反倒偏弱。

从丝绸之路的形成角度,也可以为“中国”的形成找到蛛丝马迹。丝绸之路曾给国人带来无限荣光。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首度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后来关于丝绸之路

用人类学思维去“考古”

——读张经纬《从考古发现中国》

■ 陈斌



《从考古发现中国》
张经纬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九色鹿丛书出版

的著作乃至考古日益丰富起来,当斯坦因等人从敦煌盗走诸多藏品后,敦煌学的建立与兴起,进一步提升了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

毫无疑问,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中亚乃至欧洲商业贸易的重要通道。在张经纬看来,这条道路还具备另一重意义,那就是与人类起源时代迁徙路线的重合。这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自人类形成以来,这条通道便一直存在于世,实际也是后来者进入中原,繁衍

后代,成立“中国”的重要通道。丝绸之路一路上有高山、沙漠、戈壁,充满艰辛,但相较于其它路线仍具有比较优势,这也是这条路线一直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只是到大航海时代来临后,丝绸之路的地位才逐渐西山日下。张经纬对“打哪儿指哪儿”式考古进行了严厉批判,直陈考古不是拎着答案找注脚,我们“不必畏惧中原(中国)的源头不在中原。中原不是文明之源,但仍可以是中华文明昌盛的舞台”。

气候变化是导致北方民族南迁的重要原因,这是学界的一个重要观点。对此,张经纬认为,这一观点存在选择性错误,当“举出一个天气变冷和人群迁移吻合的例子,就有另一个不吻合的例子等着”。这种南迁到底是否像张经纬所说的“想南迁就迁”,还是因为人们定居能力的强化,对南部自然环境改造尤其是逐水而居能力的提升有着更大关联,似乎还有待探索。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是冀朝鼎的名著。张经纬不唯书,认为冀朝鼎以水利工程为线索的研究方式并不能佐证“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

济区”形成原因,反而认为,“基本经济区的变迁,实际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的结果,而非原因”。换言之,政治生态决定了生存状态,水利对经济的影响肯定存在,但远未达到关系一地兴衰的地步。

张经纬对人参在明清时代的“赋魅”分析入木三分,对神话形成的历史变迁也有精彩的阐释。如果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么神话更是如此。神话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上天”赋予不可求证的力量,以期达成目的。正是因为这种特殊力量文化的延续,作为神话重要解读者,往往会按照有利于自身的方式加以解读,此即“一切神话都是当代神话”。比如“普罗米修斯在赫西俄德的诗中是个歹徒,是个骗子,在阿提刻是位小神;但是经过埃斯库罗斯的塑造,他成为一位敢于为人类的生存和幸福而反抗宙斯的伟大的神”。因此,要真正理解原神话的隐喻意义,必须尽可能找到神话的真正源头。

最后想说明的是,张经纬的文章轻松诙谐,道理简单通透,金句迭出,即使笔者这样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双料”门外汉,读来也未觉生涩,反倒酣畅淋漓收获满满。字里行间可见,张经纬阅读量巨大,记忆力惊人,思维跳跃性十分突出,尤其是对比式研究和发散性思维常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也许,张经纬的许多观点有待考古学界以事实反证,但他的观察尤其是写作方式颇为值得学习。

陈白沙及其引发的心学公案

——评《陈献章全集》

■ 陈畅

陈白沙(陈献章,世称白沙先生)是与王阳明并称明代心学两大代表人物的思想家。学术界习惯把陈白沙定位为明代心学的开端,陆九渊和王阳明之间承前启后式的心学宗师。这种定位大体成立,但其中某些含混之处有待澄清。例如,心学最不同于宋明理学其他思潮之处在于,它是多元而复杂的思想体系,内部尚存诸多差异。“开端”、“承前启后”之类的文字往往会抹煞其中的思想差异,故而上述习惯看法中需澄清处包括:白沙与阳明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如存在,分别属于什么类型的心学?事实上,明代心学内部已有定论,江右王门王塘南用心性之学的“行话”总结说:“阳明之学,悟性以御气者也。白沙之学,养气以契性者也。”大白话就是,白沙是主静的心学,阳明是主动的心学。

黄宗羲曾提出疑问:“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不知阳明后来从不说起,其故何也?”明中期以前,朱子学一统天下,阳明与白沙同属尚处弱势的心学阵营,于理而言,难以理解“从不说起”;阳明与白沙得意门生湛甘泉知己挚友,于情而言,阳明“从不说起”更启人疑窦。从现存阳明文献看,阳明也非完全“不说起”白沙。深圳大学哲学系黎业明教授通过细致的文献梳理,令人信服地指出,阳明不愿多提白沙是在正德十五年以后——此前,阳明与湛甘泉关系友好,多次提及白沙并有所认同;此后,阳明与湛甘泉在学术宗

旨上产生分歧而激烈辩论,不愿称颂或批评白沙。这种“欲说还休”的状况,直至阳明第一代弟子摆脱上一辈学者之间人情世故的羁绊,才得以回到学术思想本身而直面其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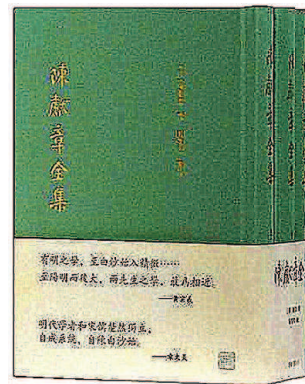
阳明去世后,其弟子在如何评价白沙与阳明的问题上产生尖锐分歧。阳明晚年得意弟子王畿说:“白沙之学,以自然为宗……于先师所悟入处,尚隔毫厘。”王畿认为阳明学术与白沙学术有本质的差异,且据此批评白沙学术。江右王门主力聂豹则认为:“周程以后,白沙得其精,阳明得其大。”“精”是专深精密,“大”是广博宏大。聂豹实际上认为白沙学术比阳明学术更高一筹。这种针锋相对的分歧,与阳明去世之后良知学的不同发展方向之冲突有关。换言之,王畿与聂豹对白沙的不同评价,涉及心学思想的两种不同发展方向,这两种不同方向事实上也构成了中晚明时代心学发展的内在张力。

根据阳明心学“心即理”命题,天理不是心体的认知对象,而是心体之天理;心体自作主宰,天地间万事万物都是透过心体良知的判定而显现其意义。换言之,在阳明心学体系中,万物之秩序建立在心物感应机制中“我的良知灵明”基础之上,由“我的良知灵明”肩负所有的责任担当。这是阳明心学勇于担当、富有道德激情,以积极进取的狂者胸次为特质的理论根源。如阳明后学、泰州学派集大成者罗汝芳以急公好义著称,为救人甚至不惜代人行贿

或出钱悬赏。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泰州学派学者的特点是多能以赤手搏龙蛇——勇于挣脱名教的束缚,桀骜不羁,善于谋事。近代康有为说“言心学者必能任事”,就是基于这一特点。然而,问题也出在这里。因为良知生发于个体心层面,无所拘束的个体心当下呈现的未必是良知,可能是情欲恣肆,也可能是脱离现实基础的虚幻价值。这就无法避免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万物之上。

不同于阳明将万物秩序建立在良知灵明的基础上,白沙把调节伦理秩序的权力交还给自然。“人心本来体面皆一般,只要养之以静,便自开大”,白沙主张自然秩序是最完善的秩序,万物在其中以“自在”的方式保持生机自由生长,没有外在力量的干扰。白沙的“养之以静”,吸收了道家让开一步的“不生之生”智慧,在自然面前放下一切理智造作,令万物以自己的方式呈现自己。虚静非不作为,而是以自然的原则维护世界的一体多样性;以自然、自体自作主宰,天地间万事万物都是透过心体良知的判定而显现其意义。换言之,在阳明心学体系中,万物之秩序建立在心物感应机制中“我的良知灵明”基础之上,由“我的良知灵明”肩负所有的责任担当。这是阳明心学勇于担当、富有道德激情,以积极进取的狂者胸次为特质的理论根源。如阳明后学、泰州学派集大成者罗汝芳以急公好义著称,为救人甚至不惜代人行贿

中晚明时代,阳明良知学风行天下,缘于其倡导学者积极主动地投入到为善去恶的社会实践中,而白沙的主静之学并不能满足阳明学派信徒积极改造社会的要求。对于阳明学派信徒来说,解决良知



《陈献章全集》
黎业明编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学“情识而肆,玄虚而荡”流弊的途径,仍在于依赖锤炼充沛而敏锐的良知力量,而非通过“主静”消解道德热情。因为理想社会有赖人们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主动争取,真理及其效应是人们在学习过程中积极思考的结果。基于此,王畿明确批评白沙只是孔门别派,其主静之学只是解决世人精神没撒、向外驰求问题的权法而已。

这一延续近百年的争论,直到晚明才得到解决。心学大师刘宗周所著《皇明道统录》对“世推为大儒”的陈白沙颇多贬辞,甚至斥为“禅学”。有趣的是,刘宗周在晚年反复研讨白沙之学,感叹白沙之学绝非他在《皇明道统录》中所认为的那么简单:“静中养出端倪,今日乃见白沙面。”由贬转褒的评价变化,背景是刘宗周基于对晚明学术与政治的沉痛反省,积极钻研对治阳明学流弊以救世的全新学术。刘宗周晚年的思想洞见,经由其弟子黄宗羲阐发,以明代思想与政治之全面批判总结的方式展现。这是明代白沙主静的心学与阳明主动的心学之对峙的合理总结,更是明代心学发展与现实政治互动的一个投影。

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欲了解心学,阅读白沙著作是最好的方式之一。黎业明编校的《陈献章全集》是目前收集最完备、考订最精详的陈白沙文献集。